論司馬遷「成一家之言」的兩個層次

《太史公自序》的「拾遺補藝」

（上）

逯耀東

一、前　言

司馬遷撰寫史記，最終的目的是想「成一家之言」。在他的著作之中，卻存在著兩個「成一家之言」。一是《史記・太史公自序》最終所說「以拾遺補藝，成一家之言」。一是《漢書・司馬遷傳》引〈報任安書〉的「欲以究天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」。

因此，司馬遷有兩個「成一家之言」，雖然追求的目標一致，但表現的意義卻不相同，而且進行的程序也有先後的層次。前者經過「厥協六經異傳，整齊百家雜語」的過程，對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後的學術發展與演變，作一次系統性的整理。後者則是將經過整理後系統化的資料，納入時間的框限之中，即所謂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，考之行事，稽其成敗興壞之理」。二者綜合起來，就是對先秦學術作一次系統而總結性的整理，然後爲中國史學拓創新的境界。這是司馬遷寫《史記》的意旨所在，也是司馬遷對中國學術與史學承先啓後，繼往開來的貢獻。

「拾遺補藝」是對圖書的校整，這是目錄學領域的工作。鏡考源流，部次流別是中國傳統目錄學的精神。自來討論中國目錄學，都集中贊揚劉向、歆父子在這方面的成就，完全忽略了司馬談、遷父子對這方面的貢獻。實際上，武帝時開始的校整圖書工作，規模較成帝時大，前後負責校書祕閣的就是司馬氏父子。在校整圖書過程中，由於政治與學術的環境不同，司馬談選擇了黃老作爲主導思想，提出他的「論六家要旨」，規劃出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諸家的輪廓，是中國傳統目錄學最早的錄序。後來《漢書・藝文志・諸子略》就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司馬談壯志未酬身先死，司馬遷繼承他「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，有能紹明世，正易傳，繼春秋、本詩、書、禮、樂之際」的未竟遺志，「悉論先人所次舊聞」，繼續圖書校正的工作。但爲了適應當時轉變的學術與政治環境，將孔子所成的六藝，獨立於儒家之外，並超越各家之上，成爲一個學術的專門領域，班固《漢書・藝文志》的〈六藝略〉由此而出，同時也鑄定以後中國目錄學經部的版型。

所以，司馬談、遷父子在這面的貢獻，奠定劉向、歆父子校讎的基礎。本文分別一、從司馬談、遷父子校書祕閣，二、司馬談的先黃老，三、司馬遷敘孔子六藝之成各方面，探討史記太史公自序的「拾遺補藝，成一家之言」。

一、司馬談、遷父子校書祕閣

《漢書・藝文志・詩賦略》的屈賦之類下，有「上所自造賦二篇」，顏師古注曰：「武帝也」。也就是這兩篇賦的作者是漢武帝。雖然班固的〈藝文志〉，以劉向、歆的《別錄》與《七略》爲藍本編撰而成。但劉氏父子去武帝時代已遠，論理說不應稱武帝爲「上」的。「上」是臣工對當代君主的稱謂。所以，章學誠認爲「上所自造字，必武帝時人標目，劉向從而著之，不及審定稱謂」。[1]

章學誠的疑惑，引發出另一個問題，那就是劉氏父子校讎祕閣、編撰簿錄其來有自，淵源於武帝時所編纂的目錄。這部目錄很可能是司馬遷著書時，原有的辨章學術，鏡考源流的簿錄工作。但沒有成書，而分散於百三十篇之中，但所撰述的底稿，仍有鈔本流傳或藏於祕閣之中，劉氏父子將這部底稿納入己書，班固因循未改，也是非常可能的。[2]

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，稱武帝爲「上」或「今上」。卷一三〇〈太史公自序〉曰：「漢興五世，隆在建元，外攘夷狄，內修法度，封禪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作今上本紀」。今上就是漢武帝，《史記》很多地方這樣稱呼。案《漢書・劉向傳》：「上方精於詩書，觀古文，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」。此處所謂的「上」是成帝。《漢書・藝文志・諸子略・儒家類》，有〈高祖傳〉十三篇與〈文帝傳〉十一篇，顏師古分別注曰：「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」。及「文帝所稱及詔策」。《漢書・藝文志》對高祖與文帝都不稱「上」，唯獨對武帝稱「上」，的確是非常有趣，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。

1. 章學誠《章氏遺書》卷十三〈校讎通義〉內篇三：　漢書藝文志十五之五。
2. 張舜徽《漢書藝文志通釋》（湖北：教務出版社，一九九〇年，），頁一〇九。

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

《漢書・藝文志》除了「上所自造賦兩篇」外，在所著錄的書籍作者下，往往出現「有列傳」的小注。中國傳統目錄學體制，綜合而言有三：一是考一書源流的篇目，二是考一人源流的敘錄，三是考一家源流的小序。[3] 對於考一人源流的敘錄，章學誠認爲劉向、 劉歆「其校書諸敘論，既審定其編次，又推論其生平，以書而言，謂之敘錄可也。以人而言，謂之列傳可也。史家存其部目於藝文，載其行事於列傳，所以爲詳略互見之例也。是以諸子、詩賦、兵書諸略、必注有列傳三字於其下，所以使人參互而觀也」。[4]

《漢書・藝文志》諸子、詩賦、兵書諸略，於作者名下注「有列傳者」，計有晏子、孟子、孫卿子、魯仲連、商君、管子、蘇子、張子、屈原賦，吳起，魏公子等十一種。顏師古在《晏子十八篇》下注稱：「有列傳，謂太史公書」。以上諸書作者，《史記》中不僅有列傳，司馬遷除論其行事外，並對他們著作的大要歸指，皆有所敘論。所以，《漢書・藝文志》所著錄的這些著作、及「上所自造賦兩篇」下的小注，很可能出自司馬氏父子的手筆。

《漢書・藝文志・諸子略・道家類》有〈管子八十六篇〉，其下小注曰：「名夷吾，相齊桓公，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也」。案《史記・管晏列傳》太史公曰：「吾讀管氏牧民，高山，乘馬，輕重，九府」。正義引《七略》曰：「管子十八篇，在法家」。與《漢志》不同。《四庫提要・管子條》下說：「葉適水心集亦曰：管子非一人之手筆，亦非一人之作，考其文大抵後人附會，多于仲之本書」。所以有人認爲《管子》一書是一種雜燴，不僅不是管仲作的書，而且非作於一人，也非作於一時，大約是戰國及其後期的一批零碎著作的總集，一部份是齊國的舊物，一部份是漢朝開獻書之令時，由齊國地區獻過來的。[5]《管子》中有儒、道、法、兵、農、縱橫、 陰陽各家的言論，嚴格說，《管子》一書可入雜家。所以，《管子》在漢代出現時，已經是一部範圍包羅甚廣，內容非常駁雜的資料彙編。在劉向校書之前，已有幾種不同的校本。劉向〈晏子書錄〉云：

>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：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，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，臣富參書四十一篇，校尉立書十一篇，太史書九十六篇，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，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，定著八十六篇。殺青而書，可繕寫也。

---

3. 余嘉錫《目錄學發微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七五年）， 頁二六。
4. 同注 1《漢書藝文志》十三之三。
5. 郭沫若〈宋鈃伊人遺書考〉，《郭沫若全集・歷史篇》第一卷〈青銅時代〉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二），頁五四七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劉向所校定的《管子》八十六篇，即《漢書・藝文志・道家類》所著錄的《管子書》。在劉向所校的管子校本中，有《太史書》九十六篇，和劉向的管子定本最接近，所謂「太史書」，可能就是司馬氏父子所校的《管子》。

司馬氏父子在武帝時校書祕閣，定其歸指，案《文選》卷三十六任彥昇「爲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」李善注引劉歆《七略》：「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孫弘、廣開獻書之路，如積如山」。雖然漢初就開始收集秦火剩餘的圖籍，惠帝更下除挾書之詔，但有計劃大規模收集軼書，並建立典藏制度，卻在漢武帝時代。《漢書・藝文志序》說：

> 漢興，改秦之敗，大收編籍，廣獻書之路。迄孝武世，書缺簡脫，禮壞樂崩，聖上喟然而稱曰：朕甚閔也。於是建藏書之策。置寫書之官，下及諸子傳說，皆充祕府。

對圖書的典藏與整理，「外則有太常、太史、博士之藏。內則有延閣、廣內、祕書之府」。[6] 武帝除了設寫史之官外，並置太史令負責實際的圖書管理與整理工作。《隋書・經籍志序》就說：

> 其（戰國）後，陵夷衰變，史官放絕。秦滅先王之典，遺制莫存。至武帝時，始置太史公，令司馬談爲之，以掌其職。

司馬談既爲太史，負責石室金匱的圖書整理，又保管國家的文獻與檔案，即所謂「漢法，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，副上丞相」。[7] 於是，「百餘年間，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」。[8] 太史既負責圖書的典藏，同時就必須對圖書進行整理和校讎。因爲圖書的典藏和整理是一體兩面的工作。

掌管與整理圖書文獻，原本是古代史官的工作範圍。周禮關於太史、小史、內史、外史、御史對圖書的掌管和分工，記載得非常詳細，歸納起來，凡史官所主持的吉凶大禮及封賞慶典，所觀測的天象、氣候、所出納的王言、章奏的紀錄，乃至於所占卜的休咎跡兆，都由他們自負登記保管之責。後來更將所有的法規、盟約都交付太史錄下副本，妥藏備察。邦國之志，四方之志也一併交由史官收藏。後來掌管的範圍擴大，遂將私人的盟約，也由史官登記，三皇五帝圖書概由史官蒐藏。所以，楚懷王說左史倚相能讀三墳、五典、八索、九典之書。韓宣子至魯，觀書於太史氏。史稱老子爲「周守藏室之史」或「柱下史」，都說明圖書文獻的蒐藏，是古代史官的職掌。[9] 所以，《隋書・經籍志序》說：「書契已傳

6. 《漢書・藝文志》注引劉歆七略。
7. 《漢書》司馬遷注引「漢儀注」。
8. 《史記・太史公自序》。
9. 沈剛伯師〈說史〉，《沈剛伯先生文集》（上）（台北：中央日報，民國七十一年）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，繩木棄而不用，史官既立，經籍於是興焉」。

武帝置太史，有古代史官的遺意。司馬遷說「太史公既長天官、不治民」。[10] 其職掌的範圍，就是司馬遷〈報任安書〉自嘲說的「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」。星曆卜祝部份，案應劭〈漢官儀〉：「太史公屬太常，秩六百石，掌天時星曆。凡歲奏新年曆，凡國祭祀喪要之事、奏良日，國有瑞應災異，記之」。這是史官的原始職掌部份。至於「文史」則是關於文字工作的處理，及圖書檔案的保管和整理。關於文字工作的處理，《漢書・藝志・六藝略・小學類》條下：「蕭何草律，亦著其法，曰：太史試學童，能諷書九千字以上，乃得爲史」。至於圖書檔案的保管與整理，則是史官職掌擴大後的工作範圍，太史令屬官有望郎與掌故各三十人，分別負責「星曆」和「文史」的工作。司馬遷說司馬談，「於建元元封之間」任太史公。其間歷元光、元朔、元狩、元鼎，至元封元年「發憤且卒」，前後近三十年。司馬談的行事除見於封禪書，和祠官寬舒討論封禪與設壇外，就是在〈太史公自序〉中的「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，乃論六家要旨」了。這是太史掌管圖書工作具體的表現。

所謂「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，乃論六家要旨」。悖，正義引顏師古曰：「惑也。各習師說，惑於所見」。所謂「各習師說，惑於所見」，即《史記・十二諸侯年表序》太史公曰：

> 儒者斷其義，馳者騁其辭，不務其終始；曆人取其年月，數家隆其神運，譜諜獨記世謚，其辭略，欲一觀其諸要難。

學者不務終始，欲一觀其諸要難，正是戰國以來，百家爭鳴，各顯其說的學術發展情況。《莊子・天下篇》說：「悲夫，百家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。後世學者，不幸不見天地之純，古人之大體，道術將由天下裂」。的確是這個時期學術情況的實際反映。另一方面，先秦的書籍經秦火之後，焚銷散亂，《史記・六國年表序》太史公曰：

> 秦既得意，燒天下詩書，諸侯史記尤甚，爲其有所刺譏也。詩書所以復見者，多藏人家，而史記獨藏周室，以故滅。惜哉，惜哉！

「惜哉，惜哉！」不僅是司馬氏父子對秦火焚書的感嘆，也是他們校書過程中，遭遇的實際困難。所以，司馬談在奉命整理圖書之時，似乎就立下心願，對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以來，尤其戰國至漢代的學術發展與演變，透過對圖書的校定，作一次系統的整理，祇是這個工作一直到他死時沒有完成，然後由司馬遷繼承其遺

10. 《史記・太史公自序》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志繼續進行。《史記・太史公自序〉太史公曰：

> 先人有言：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年，有能紹明世，正易傳，繼春秋，本詩書禮樂之際，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讓也。

對司馬遷的「小子何敢讓也」，揚雄、孫盛認爲實在自不量力。[11] 但就中國學術的發展與興衰而言，秦焚詩書是一個分水嶺。自秦以前遠溯上古的學術發展，經孔子刪定後，作了第一次的集結，即所謂「古者史官既司典籍，蓋有目錄，以爲綱紀，體制埋沒，不可復知，孔子刪書、別爲之序，各陳作者所由」。[12] 自此而後，中國文獻始有可徵。所以，孔子是保存先秦文獻的第一人。[13] 此後五百年，其間經歷秦焚詩書，載籍渙散，至漢武帝大規搜集軼書，然後司馬氏父子出，籍校書祕閣，對孔子以來的學術思想演變，作一次系統的整理，這是中國文獻的第二次集結。所以，司馬氏父子欲以承五百年之運，繼孔子之業以自任，這是司馬遷說「小子何敢讓也」的原因。因此，司馬遷〈太史公自序〉說：

> 我漢繼五帝之末，接三代絕業，周道衰，秦撥去古文，焚滅詩書，故明堂、石室、金匱玉版、圖籍散亂。於是漢興，蕭何次律令，韓信申軍法，張蒼爲章程，叔孫通定禮儀，則文學彬彬稍進，詩書往往間出矣。自曹參薦蓋公，言黃老，而賈生、晁錯明申韓，公孫弘以儒顯，百餘年間，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。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。曰：於戲！余維先人嘗掌斯事，顯於虞唐，至於周，復典之、故司馬氏世主天官，至於余乎，欽念哉，欽念哉！

「欽念哉，欽念哉！」是司馬遷自勉之詞。以上材料說明漢初至武帝百餘年間，蕭何、韓信、張蒼等，各人因不同的政治需要，曾對不同類別的圖籍，作過初步的整理，這些經過整理的籍圖，最後都集中在司馬氏父子處。他們就利用這個基礎，對所有的圖籍作一次整體而系統的整理，所以，司馬氏父子不僅是劉氏父子的先行者，並且爲以後中國目錄學開闢了新的道路。

不過，自來討論中國目錄學，都推崇劉氏父子的拓創之功。章學誠《校讎通義》就有〈宗劉篇〉，並且說「劉向父子部次條別，將以辨章學術、鏡考源流，非深明道術精微，群言得失之故者，不足與此」。完全忽略了司馬氏父子在這方面的貢獻。事實上，武帝時對圖籍的搜求，就規模與範圍而言，都超過成帝時代

11. 《史記・太史公自序》索隱案。
12. 《隋書・經籍志序》。
13. 鄭鶴聲《司馬遷年譜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五七），頁一二七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。而且參與整理工作的，也不僅限於司馬氏父子。《漢書・藝文志・兵書略》小序就說：「武帝時，軍政楊僕摭拾遺逸，紀奏兵錄，猶未能備」。楊僕的兵錄，就是據張良，韓信序次的軍法爲基礎整理的。司馬氏父子則是當時所搜羅的圖籍，作了總結性的整理與校定。祇惜資料不全無法考證。不過仍有許多線索隱於史記中，可供探索的。

關於劉氏父子校書，《隋書・經籍志・史部・簿錄序》說：「劉向別錄、劉歆七略、剖析條流，各爲之部，推其事跡，疑則古之制也」。所謂「古之制也」，是說劉氏父子部次條流有所繼承的，關於這個問題章學誠認爲「漢志最重學術源流，似得自太史公敘傳，及莊周天下篇，荀卿非十二子」。《莊子・天下篇》、《荀子・非十二子》討論戰國學者的異同，對劉向、劉歆有啓導作用，至於「司馬遷之載籍也。疏而有理，蓋能朔原」。[14] 所以，章學誠也承認在敘述學術源流方面，劉向、劉歆及班固，的確受了司馬遷的影響。所以，章學誠說：

> 藝文雖始於班固，而司馬遷之列傳實討論之，觀其敘述戰國秦漢之間，著書諸人之列傳，未嘗不於學術淵源、文詞流別、反復而論次焉。劉向、劉歆蓋知其意矣。故其校書諸敘論，既審定其篇次，又推論其生平，謂之敘錄可也。以人而言，謂之列傳可也。史家存其部目於藝文。載其行事於列傳，所以詳略互見之例也。[15]

所謂「劉向、劉歆蓋知其意焉」。也就是司馬遷對戰國秦漢間，著書諸人的學術淵源與文詞流別，都敘述得非常詳細，後來劉向、歆父子校書的敘錄即淵源於此。

在史記中關於戰國秦漢間著書諸人，以及有關學術流變的列傳，計有管仲晏嬰、老子韓非、司馬穰苴、孫子吳起、仲尼弟子、商君、蘇秦、張儀、孟子荀卿、呂不韋、魯仲連鄒陽、屈原賈誼、扁鵲倉公、司馬相如、儒林、日者、龜册等十七篇，佔七十列傳四分之一強，如將附各傳的著書諸人計入，當不止此數。這也反映司馬氏父子對著書諸人，及戰國秦漢之間的學術流變是非常重視的。這和整理圖書所得到的材料有關。

二、司馬談的先黃老

雖然，司馬遷著書，有其書世多有之，是以不論，論其軼事的體例。這種以

14. 同注 1〈諸子略〉三四。
15. 同上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人繫事的寫作方法，突出史記列傳論其行事的性格。但對於重要的學術思想的流變與承傳，則反復敘論。所以，對於老子的學術思想。《史記》卷六十三〈老子韓非列傳〉說：

> 老子修道德，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。居周久之，見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關、關令尹喜曰：子將隱矣。彊爲我著書。於是著書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，不知所終。

敘述老子著書的經過，然後又說：

> 世之學者老則絀儒學，儒學亦絀老子，道不同不相爲謀，豈是之謂也。李耳無爲自化、清靜自正。

「無爲自化，清靜自正」，是老子思想的核心，正義曰：「此結老子也」。最後於篇末的「太史公」曰，則對老子學說的承傳與對各家的影響，作了扼要的說明：

> 老子所貴道，虛無，固應變化於無爲。故著書辭微妙難識。莊子散道德、放論。要亦歸之自然。申子卑卑，施之於名實。韓子引繩墨，切事情，明事非，其極慘礉少恩，皆原於道德之意，而老子深遠矣。

老子與韓非合傳，後世學者多有微詞。而且對關於老子的傳說，自戰國以來就衆說紛紜。司馬遷歸納這些傳說，以蓋與或曰的形式，來敘述這位「隱君子」。[16] 其目的不在「論其行事」，不過籍此鏡考自戰國以來就流行，對漢初政治與學術思想發生重大影響的學說，其源流所自以及流派的演變。司馬遷在他的自序中就說「李耳爲自化，清靜自正，韓非揣事情、循執理、作老子韓非列傳」。所以，司馬遷寫老子韓非列傳，完全以鏡考學術源流爲著眼點。

至於老子思想的承傳，司馬遷說莊子、韓非、申子之學皆本本道德意。莊子「其學無所不闚、然其本歸於老子之言」。而韓非「喜刑名法術之學，而歸本於黃老」。至於申子之學也是「本於黃老而主刑名」。

所謂「黃老」，劉向說：「黃老之法不尚繁華，清簡無爲，君臣自正」。這種黃帝老子並稱的「黃老」思想，在戰國後期形成，對漢初的政治，發生重大的影響，是當時學術的主流。但黃老並稱，不見於他書，由司馬氏父子首先提出。因此，《史記》對這種學術思想的形成、流變與傳承作了詳細的探討。

劉向所謂「清簡無爲、君臣自正」，正是黃老之學表現於政治的意旨所在。

16. 拙作〈漢武帝封禪與《史記・封禪書》〉，《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（台灣・台中：民國八十二年二月）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在漢初援黃老入政的是曹參。即自序所謂「曹參薦蓋公，言黃老」。《史記・曹相國世家》說：

> 參之爲齊相，齊七十城。天下初定、悼惠王富於春秋，參盡召長老諸生，問所以安集百姓，如齊故儒數百，言人人殊，參未知所定，聞膠西蓋公，善治黃老、使人厚幣請之。既見蓋公，蓋公爲言治道，貴清無爲而民自定，推此類具言之。參避居正堂，舍蓋公焉。其治要用黃老術，故齊九年，齊國安集，大稱賢相。

後來曹參繼蕭何爲丞相，由地方到了中央、其治國仍用「清靜而民自定」的黃老術。曹參爲漢相國三年卒。百姓歌之：「蕭何爲法、顜若畫一，曹參代之，守而勿失，載其清靜，民以寧一」。司馬遷對曹參以黃老術治國，予以很高的評價。曹相國世家的「太史公曰」：「參爲相國，清靜極言合道，然百姓離秦之酷後，參與休息無爲，故天下俱稱其賢」。

曹參的黃老術得自蓋公。膠西蓋公則受教於樂臣公。《史記・樂毅傳》云：「樂臣公教蓋公。蓋公教於高密，膠西，爲曹相國師」。司馬遷於於樂毅傳的「太史公曰」，對秦楚之際黃老之學的承傳，作了詳細的敘述：「樂臣公學黃帝老子，其本師河上丈人，不知所出。河山丈人教安期生教毛翕公；毛翕公教樂瑕公；樂瑕公教樂臣公；樂臣公教蓋公」。

樂臣公除教蓋公外，田叔也從樂臣公習黃帝老子，後士於趙王張敖。《史記，田叔列傳》稱其「學黃老之術於樂臣公所」。案《索隱》曰：「臣公本燕人，樂毅後」。《史記・樂毅傳》稱：「樂氏族，有樂瑕公，趙且爲秦所滅，亡之秦高密，樂臣公善修黃老之言，顯聞於齊，稱賢師」。樂臣公在秦滅趙之後，流亡到齊國，設帳授徒傳黃老之言。司馬遷敘秦楚之際黃老之術的承傳情形，大致是可以相信的。[17]

至於司馬氏父子鏡考黃老之言的淵源，則認爲出自於齊之稷下。《史記・田敬仲完世家》說：「宣王喜文學說游說之士，自鄒衍、淳于髡、田駢、接子、愼到、環淵之徒七十六人，皆賜列第、爲上大夫，不治而議論。是以齊稷下之學復興，且數百千人」。稷下學士，「不治而議論」。其議論立說成書，所著書「言治亂之事」。而其所著書，「皆學黃老道德之術」。《史記・孟子荀卿列傳》：

> 愼到，趙人。田駢、接子，齊人。環淵，楚人，皆學黃老道德之術。因發

17. 錢穆師《先秦諸子繫年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重印本，一九八五年十月），卷三〈稷下通考〉條下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明其旨意。故慎到著十二論。環淵著下下篇。接子皆有所論。

《漢書・藝文・諸子略・法家類》有〈慎子〉四十二篇。注稱：「名到，先申韓、申韓稱之」。道家類有〈田子〉三十五篇。注稱：「名駢，齊人。遊稷下，號天口駢」。道家類又有捷子二篇。案錢大昭《漢書辨疑》稱：接、捷、古字通，則捷子即接子。道家類又有〈娟子〉十三篇。注稱：「名淵，楚人，老子弟子」。師古注曰：「娟，姓也」。娟爲環之借字。案應劭風俗通姓氏篇：「環氏出楚環列之尹，復以爲氏」。張澍《風俗通輯注》稱「環淵即娟淵」。又名家類有〈尹文子〉一篇。注稱：「說齊宣王、先公孫龍子」。師古注引劉向曰：「關尹子與宋駢俱稷下」。案《漢書・藝文志・小說家類》有〈宋子〉十八篇、注稱「荀子道宋子，其言黃老意」。

慎到、接子、田駢、環淵、尹文、宋駢、同爲司馬遷所謂的稷下之士，《漢書・藝文志》分別將他們的著作置於諸子略的道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小說家各類中。雖然類別不同，但卻有一個共同的性質，那就是「其言黃老意」。《莊子・天下篇》首先討論詩、書、禮、樂與易的古道術之源。認爲最先得之者是孔子。然後傳授於鄒魯之士的縉紳先生。最後才是百家之學。百家依次將墨翟、禽滑厘歸爲一類；宋鈃、尹文爲一類；彭蒙、田駢、慎到爲一類；關尹、老聃爲一類：莊周自爲一類；最後是施惠，公孫龍爲一類。

如果《莊子・天下篇》，討論百家之學的形成與發展，依時間的先後爲序。則稷下學士宋鈃、尹子、慎到、田駢之學，或當在老聃之前。老子在漢代已「世莫能知其所以然否」，老子之學至「詆訾孔子之徒、以明老子之術」的莊子、才顯於世。司馬遷將老子與韓非合傳、並附申子、並且說韓非，申不亥之學，皆源道德之意。所謂道德之意即黃老之學。老子韓非列傳說韓非「喜刑名法術之學，而歸本黃老」。而申子之學「本黃老而主刑名」。他們二人的「刑名」之學，都淵源於黃老。案如上述《漢書・藝文志・諸子略・法家類》有〈申子〉四十二篇。注稱：「名到，先申韓，申韓稱之」。《四庫全書》有慎子一卷，入子部雜家類。提要曰：「周慎到撰。漢書藝文志列於法家。今考其書，大旨欲同物理之當然，各定一法以守之、不求於法外，亦不寬於法之中，則上下相安，可以清靜而治。然法有不行。勢不能不以刑齊之，黃老之爲申韓，此其轉關矣」。

《四庫總目提要》認爲《慎子》一書，是黃老轉變爲名法的關鍵。也就是申韓的名法之學，淵源於稷下的慎到而非李耳。《莊子・天下篇》，慎到、田駢與彭蒙並論，並說：「慎到棄知去己，緣不得已，冷汰於物，以爲道理」。《荀子・非十二子說》，「其言之理，足以欺惑愚衆，是慎到、田駢也」。並且批評他

們：「尚法無法，下修而好作。上取聽於上，下則取從於俗。終日言成文典。反細察之則倘然無歸宿。不可以經國定分」。《荀子・解數篇》又說：「慎子蔽於法不知賢」。天論篇則說「慎子見於先，無見於後」。荀子對慎子的批評「蔽於法而不知賢」。是申韓刑名之學的所自。至於「有見於先無見於後」，則與老子道學的旨意相合。[18]

與慎子同在稷下，「立說在黃老申韓之間」的，還有尹文。《漢書・藝文志・諸子略・名家類》，有〈尹文子〉一篇。注稱：「說齊宣王，先公孫龍子」。師古注引劉向云：「與宋鈃俱游稷下」。《四庫全書》錄著〈尹文子〉二卷，入雜家。《四庫提要》云：「大旨陳治道，欲自處於虛靜，而萬事則一一核其實，故立說放在黃老、申韓之間」。與尹文同遊稷下的田鈃。《莊子・天下篇》與慎到並論。前述《漢書・藝文志・道家》有〈田子〉二十五篇。班固說田鈃曾遊稷下，號天口鈃。《呂氏春秋・不二篇》：「陳鈃貴齊」。錢大昭《漢書辨疑》稱：「陳、田古今通用，則陳鈃爲田鈃」。所謂「陳鈃貴齊」，高誘注稱：「陳鈃，齊人也，作道書二十五篇。貴齊，齊生死，等古今」。《莊子・天下篇》說慎到之學，「齊萬物爲首」。也就是「萬物皆有所可，皆有所不可」。所以，慎到、田鈃的「齊生死、等古今」。與莊子之學略似，或者是承楊朱的重生貴已而來。[19]

因此，司馬氏父子所謂「皆學黃老意」的稷下學士，是戰國時期諸子學說没成形前，流行的學術思想流派。這種學術思想對後來包括道法、名、陰陽等家思想都發生影響。至於稷下學士的思想流派，如何依托黃帝，後來又與老子思想結合，最後形成司馬氏父子所謂的黃老，似仍有跡可尋的。

《淮南子務修篇》說：「世俗之人，多尊古而賤今，故爲道者必托之神農、黃帝，而後能入道。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，因而貴之。」這種情形是先秦諸子思想形成時，常見的一種情況。劉勰就認爲諸子是入道之書，但「君子處世，疾德名之不彰，而依托古人而自顯」。[20] 所以，他認爲諸子的著作是「上古遺語、戰代記者」。戰代即戰國。也就是戰國時期的諸子學說，是將當時社會流行的殊

18. 一九七三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中，有兩個帛書的字本。 在《老子》乙本卷前，有《法經》、《十六經》、《稱》、 《道原》四種古佚書， 唐蘭認爲這四種古佚書即《漢書・藝文志》著錄的《黃帝四經》。 見唐蘭〈馬王堆出土《老子》乙本卷前古佚書研究〉，《考古學報》，一九七五年第一期。
19. 錢穆師《先秦諸子繫年》卷四〈愼到考〉條下。
20. 劉勰《文心雕龍》卷五諸子第十七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俗新知相互雜揉，然後援用古往今來已存的理論，加以系統化的整理、成爲一家之言。因爲這種援古論今的表現形式，易於爲朝野上下所接受與奉行。所以，儒家言必稱堯舜，墨家托於禹，農家上繼於神農。然稷下學士卻無所依。於是由鄒衍將黃帝納入其思想體系。

《漢書・藝文志諸子略・陰陽字類》，有〈鄒子〉四十九篇。注稱：「名衍，齊人，爲燕昭王師，居稷下，號談天衍」。又有〈鄒子終始〉五十六篇，師古注曰：「亦鄒衍所說」。《史記・孟子・荀卿列傳》說鄒衍「深觀陰陽消息而作迂怪之變，終始、大聖之篇，十餘萬言」。又說：

> 其語閎大不經，必先驗小物，推而大之，至於無垠，先序今以上至黃帝，學者所共術，大並世盛衰，因載其禨禪度制，推而遠之，至大地未生，窈冥不可考而原也。

鄒衍的學說是後來陰陽家的章本，其學說以先驗小物，然後以推至無垠的推理方法，將時間與空間結合起來，形成他的理論體系。所謂時間方面，也就是歷史的，由已知的現在推向未知遠古，將黃帝固定在已知和未知的分界線上，即所謂的「先序今以上至黃帝」，將黃帝以來的典章制度興廢，與古今的禨禪治亂結合，探索人間的盈虛消息，這就是鄒衍、「五德轉移」的理論。鄒衍將黃帝固定在已知和未知的分界上，於是，戰國興起的傳說的黃帝，經鄒衍將其納入歷史系統之後，成爲人世眞實的黃帝，然後進一步成爲華夏民族的共祖。司馬遷寫《史記》始於〈五帝本紀〉，〈五帝本紀〉又始於黃帝，多少受了這種影響。[21] 不過，這個華夏民族共祖的黃帝，在司馬遷的漢武帝時代，又騰昇爲神仙的黃帝。其騰昇的過程，就是司馬遷寫《史記・封禪書》的原因。[22]

所以，《史記》中有兩個黃帝，一是〈五帝本紀〉中歷史的黃帝，一是〈封禪書〉中神仙的黃帝。[23] 所以，在漢代關於黃帝的材料雖然豐富，但卻是非常駁雜的。《漢書・藝文志》著錄托名於黃帝，或與黃帝有關的著作，計二十一種四百四十九篇，此外還有黃帝諸臣的著作七種一百零四篇。這些著作分別著錄在《漢書・藝文志》的〈諸子略〉道家、陰陽家、小說家、兵書略的陰陽、術數略的天文、歷譜、雜占、以及方技略的醫經、經方房中，仙僊等類中。由此可以了解，由戰國時期的傳說，凝聚成黃帝，流傳到漢代，尤其漢武時代，已有許多不

21. 拙作〈史傳論贊與史記「太史公曰」〉，《新史學》第三卷第二期（台北：一九九二年六月）。
22. 拙作〈漢武帝封禪與史記封禪書〉。
23. 同上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同的面貌。對於這些分散在《漢書・藝文志》不同形式的著作，班固將其歸納成兩數類：一是起於「六國時，與老子相似」；一是「于誕依托」。

關於「于誕依托」的一類，多出漢武帝時代的方士之手，由漢武帝封禪求仙的需要應運而生的。[24] 至於「起於戰國，與老子相似」的黃帝著作。《隋書・經籍・道經部》小序說：「漢時，諸子道書之流，有三十七家。大旨皆玄談，處沖虛而已。其黃帝四篇、老子二篇，最得深旨」。黃帝四篇即黃帝四經，著錄於《漢書・藝文志・道家類》。注稱：「起六國時，與老子相似」。道家類有關黃帝的著作，還有黃帝銘，黃帝君臣，雜黃帝，力牧等。對於這些著作班固皆注以「六國時所作」，或「六國時賢者所作」。

所以，在黃老沒有合流之前，黃帝、老子的著作各行其是。不過其意旨卻有相似之處，於是，莊子出，在發揚老子思想的同時，就將稷下學士依托黃帝的學術體系，納入老子思想體系以自重。[25] 討論天下治道方面，黃、老有內聖外王之別，所以，莊子〈盜跖篇〉就批評「黃帝不能致德，與蚩尤戰於涿之野，流血百里」。〈犧牲篇〉又說：「黃帝致天下，是故安而不順」。不過，在討論道的時候，莊子對黃帝卻有很高的評價。莊子「知北遊」黃帝回答知所問道的問題。黃帝曰：

> 夫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故聖人行不言之教。道不可致，德不可至，仁可爲也。義可虧也，禮相僞也。故曰：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義而後禮。禮者，道之華而亂之首也。故曰：爲道者日損，損之又損至於無爲，無爲而無不爲也。

黃帝論道，禮是道之華，但卻是亂之首。並且認爲爲道者日損，損之又損，最後至於無爲。無爲而無所不爲。黃帝又認爲天下萬物皆美者爲神奇，惡者爲臭腐。但臭腐可爲神奇，神奇也可化爲臭腐。所以，天道相通爲一氣。因此，聖人貴一。黃帝論道，與老子一般無二。至此，黃帝經莊子援引，與老子思想合一。

雖然，莊子將黃帝與老子結合起來，但並沒有出現黃老之名。將黃老並稱，作爲戰國以來的顯學儒、墨之外，另一個新興重要的學術思想，遲至司馬談奉命校整圖書之時，才由他首先提出來。就目錄學的發展而論，莊子〈天下篇〉與荀子〈非十二子〉，對戰國時期的學術代表性人物，作了初步概略的歸納。他們所

---

24. 拙作〈魏晉志怪小說與史學的關係〉，《食貨》復刊第十二卷四、五期（台北：一九八二年八月）。
25. 顧頡剛《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八八），頁六四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作的歸納，並非是爲了鏡考源流與辨其流別，祇方便對所提出的學術代表性人物，進行討論與批判。嚴格說，並不具有目錄學的意義。後來《呂氏春秋》的〈不二篇〉，對戰國以來包括老子、孔子在的十位「天下之豪士」的學術性質，作了如「老聃貴柔」、「孔子貴仁」等扼要的定性，目錄學始見端倪。但並沒有對其學術流派作具體的劃分。至韓非的〈顯學篇〉，才對代表當時顯學孔子、墨子死後，儒、墨兩派弟子因「取舍相反不同」，形成儒、墨不同的流派，目錄才初見學術流派的承傳。到了漢朝，淮南子的〈要略篇〉提出了縱橫、刑名、法等學術流派的名目及其所自。但仍無法對戰國時期學術流派的發展與流變，作整體的分析與討論。

淮南王劉安與司馬談同時，目錄學發展至此，已越超最初對個人的學術思想批判，辨章流別的學術流派的雛形已經出現。中國學術思想經孔子第一次清理之後，演變到這時已歷五百年，迫切地需要再一次的清理。於是，司馬談利用校整圖書的機會，對戰國以來駁雜的學術發展與流變，作一次徹底而系統化的整理。首先在戰國顯學儒、墨之外，更提出黃老之學。不僅將黃老作爲戰國以來，興新而重要的流派。並以黃老概括與統率陰陽、名、法、道德諸家的形成與發展。而且選擇老子作爲這個新興學派的定點。以這個定點爲關鍵，鏡考其源流與討論彼此相互的關係，至於老子是否存在是另一個問題，祇不過藉此探索一個學術流派的由來。然後，以此爲基礎，提出他的「易大傳：天下一致而百慮，同歸而殊塗、夫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，此務爲治者也」的「論六家要旨」。

司馬談的「論六家要旨」，不僅對戰國以來目錄學的發展有新的拓創。更重要的是對這個時期的學術發展與流變，作一次系統化的整理與總結。並且對經過系統化整理的學術流派，予以一個固定的分類的名稱，清晰地劃清不同學術流派間的範圍。這種分類方法後來爲劉向、歆父子繼承，《漢書・藝文志》的〈諸子略〉，即以此爲藍本形成的。祇是自來討論目錄學與中國學術流變的，忽略司馬談、遷父子在這方面的拓創與貢獻。

三、司馬遷敘孔子六藝之成

不幸的是，司馬談壯志未酬身先死，案太史公自序，元封元年（西元前一一〇年）「天子始建漢家之封，而太史公留滯周南、不得從事。故發憤，且卒」。司馬談自元始年間任太史公，到這時將近三十年了。這段期間司馬談除校整圖書外，當然還負責天官的業務，而且由於武帝封禪與求神仙，這方面的業務更繁重了。但司馬談始終恭謹從事。但臨「天子接千歲之統」的封禪泰山，竟被摒留滯

臺灣大學圖書館

周南，因而發憤且卒。[26] 臨終前，司馬遷適西使歸來，見父於河洛間。司馬談執遷手而泣曰：

> 余死，汝必爲太史。爲太史、無忘吾所欲論著矣。……遷俯首流涕曰：小子不敏，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，弗敢闕。

司馬談所謂的「所欲論著」，包括他正在進行的校整圖書，以及在校整圖書過程中搜集材料，並準備撰寫的太史公書，事實上這個工作已經開始。[27] 所以，司馬談卒後三年，即元封三年（西元前一〇八年），司馬遷續爲太史令，立即「紬史記，石室金匱之書」，繼續進行司馬談校整圖書的未竟之業。太初三年（西元前一〇四年），司馬遷與上大夫遂壺遂等所訂定律曆已經完成，圖書校整工作似也告一段落。於是，司馬遷開始著手撰寫《史記》。司馬氏父子校整圖書，並沒單獨成書。但司馬遷都將有關這方面的資料，分散在史記有關的篇節之中。所以，章學誠說：

> 讀六藝者，必參觀儒林傳。猶之讀諸子略，必參觀於孟荀、管晏、申韓等列傳也。詩賦略之鄒陽，枚乘、相如、楊雄等，兵書略之孫吳、穰苴等傳、術數略之龜策、日者等傳。方技略之扁鵲、倉公等傳，無不皆然。孟子曰：誦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？藝文志始於班固，而司馬遷列傳，實討論之。[28]

章學誠認爲讀班固《漢書・藝文志》的六藝、諸子、詩賦諸略，必須與《史記》若干著書諸人列傳相互參讀。因爲史記在這些著書諸人的列傳中，對生平、著書過程，著作性質，著者學術的由來，與其後的學術的承傳，都各作敘述。其形式與劉向、歆父子校書所著的敘錄相似。所謂敘錄，「既審定其篇次，又推論其生平，以書而言，謂之敘錄可也」。雖然劉氏父子對七略分家未敘其由來，但以前必有傳授，若溯其來由，則諸子十家，可觀者九流，淵源於司馬談的「論六家要旨」，諸著書敘錄，則承司馬遷著書諸人的列傳而來。這也是章學誠說「藝文始於班固，司馬遷列傳實討論之」[29] 的原因。

司馬遷對著書諸人，在《史記》中有個人單獨的列傳，二人的合傳及若干人合而爲一的類傳，敘述其著述之由來，承傳之所自，著述之要旨，與彼此間的學

---

26. 拙作〈漢武帝封禪與《史記・封禪書》〉。
27. 史記撰作，司馬談在世時已具規模，本紀、世家、書、 列傳四體已備，見顧頡剛〈司馬談作史〉，賴長揚〈司馬談作史補證〉，趙群生〈司馬談作史考〉。
28. 同注 1。
29. 同注 1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術關係。如《史記》自序說「獵儒墨之遺文，明禮義之紀統，絕惠王之利端，列往世之興廢，作孟子荀卿列傳」。又「孔子述文，弟子興業，咸爲師傳，崇仁厲義，作仲尼弟子列傳」。至於作老子〈韓非列傳〉，則是「李耳無爲自化，清靜自正、韓非揣事情，循執理」。二者合傳，由於韓非「喜刑名法術之學，而其歸本黃老」。至於韓非著書，傳稱：

> 非爲人口吃，與李斯俱事荀卿。非見韓之削弱，數以書諫，韓王不能用。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，執勢以御其臣下，富國強兵而求人任賢，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實功能上。以爲儒者用文亂法，而俠以武干禁。寬則寵名譽之人，急則用介胄之士；今者所養非所用，所用非所養。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，觀往者得失之變，故作孤憤，五蠹，內外儲，說林，說難十餘萬言。

司馬遷對韓非的師承，著書由來及要旨、篇目皆有敘述，是一篇典型的敘錄寫作形式。後來劉向、歆父子校書的敘錄，一準於此。

韓非之師爲荀卿。荀卿則因「嫉濁世之政，亡國亂君相屬，信禨祥，鄙儒小拘，如莊周等之猾稽亂俗，於是推儒、墨、道德之事興壞，序列著數萬言」。[30]至於呂不韋的呂氏春秋，因「是時多辯士，如荀卿之徒，著書僄天下。呂不韋乃便其賓客人人著所聞，集論以爲八覽、六論、十二紀、二十餘萬言，以備天把萬物古今之事，號曰呂氏春秋」。韓非、荀卿、呂不韋所著書，分別著錄《漢書・藝文志・諸子略》。司馬遷對著書諸人，多以合傳的形式敘述。如管晏、老子、韓非、孫子吳起、孟子荀卿等等。不過，在這些著書諸人的合傳中，受到議論最多的，則是〈魯仲連鄒陽列傳〉、〈屈原賈生列傳〉。因爲行事既不相類，時又相距百載，二人合傳似乎有些不倫不類。

《漢書・藝文志・諸子略》有《魯仲連子》十四篇。〈隋志〉作五卷錄一卷。宋以後不再見於著錄。清馬國翰採《太平御覽》、《意林》等書，輯得一卷，並以史記所載〈郤秦兵〉、〈說燕將〉等篇，與《國策》相校，文字不同，則知司馬遷直接取魯連原書，而非轉采自《國策》。輯本序說魯連子「意旨在於勢數，未能純粹合聖賢之意。然高才遠致，讀其書想見其人」。司馬遷也說魯仲連書「能設詭說」。所以本傳太史公曰：「魯仲連其意旨雖不合義，然以其多在布衣之位，蕩然肆志，不詘於諸侯，折卿相之權」。所以，《魯仲連子》一書不應在

30. 《史記・孟子・荀卿列傳》。
31. 《史記・呂不韋列傳》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儒家，似應著錄於縱橫家。

案《漢志》縱橫家有〈鄒陽〉七篇。司馬遷以鄒陽「雖然不遜，然抗直不撓」，而以附於〈魯仲連列傳〉，班固也說鄒陽「遊於危國，然卒免刑戮者，以其言正也」。[32]《漢書・鄒陽傳》說：「鄒陽齊人。漢興，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。吳王濞招四方游士，陽與吳嚴忌，枚乘等，俱仕吳，皆以文辯著名」。鄒陽因上書諫吳王，不能用。去吳歸梁孝王。《史記・梁孝王世家》說：「自山以東，游說之士，莫不畢至。齊人羊勝，公孫詭、鄒陽之屬。公孫詭多奇計」。則鄒陽是文景間著名的游士，行走於諸王廷之間。其著書〈鄒陽〉七篇，雖不知其意指如何？但應與漢初另一著名游士蒯通所著書相近。蒯通說韓信叛漢不果，佯狂而去。《漢書・藝文志・縱橫家》有〈蒯子〉五篇。《史記・田儋列傳》太史公曰：「蒯通者、善爲長短說，論戰國之權變。爲八十一首」。索隱曰：「長短說者，欲令此事長，則長說之，短則短說之。故戰《國策》亦名長短書」。魯仲連，鄒陽雖同爲齊人，並無承傳關係，而二人所處的時代環境也不同。一在戰國紛爭之際，一在漢政權統一之時。戰國時期，諸侯紛爭，游說之士蜂起，行走於諸侯之間，魯仲連以一介布衣，說義不帝秦，致書燕將解聊城之危，而堅持「所貴天下士者，爲人排患解紛亂無所取也」。[33]最後功成飄然而去，隱於海上，游說之士發展至此，可說已達顛峰。至於鄒陽在漢帝國統一之後，雖最初諸王國招士，但說長道短的空間已經不大，吳楚七國亂後，地方分權向中央集中，游說之士更無活動的餘地。鄒陽則象徵戰國形成的游士沒落一代，司馬遷「原始察終，見盛觀衰」，透過他們的著作，敘說游士之興廢，也許是他寫〈魯仲連鄒陽列傳〉的微意所在。

至於〈屈原賈生列傳〉，本傳太史公曰：「余讀離騷、天問、招魂、哀郢，悲其志。適長沙，觀屈原所自沉淵，未嘗不垂涕，想見其爲人。及見賈生弔之，又怪屈原以彼其材，游諸侯，何國不容，而自令若是。讀鵩鳥賦，同生死，輕去就，又爽然自失矣」。司馬遷對屈原的際遇非常同情，他讀古人書及探考遺跡，很少「垂涕」的。後來學者討論「屈原賈生列傳」，多從屈原賈誼的際遇方面考量。很少說到「賈誼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，天下和洽，而固爲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定官名，乃悉草具其事儀法、數用五，爲官名，悉更秦法」。

雖然文帝不能用賈誼之策，但對後來漢武帝卻發生了影響。班固注意到賈誼

32.《漢書・鄒陽傳》。
33.《史記・魯仲連鄒陽列傳》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這方面的貢獻，案《漢書・賈誼傳》班固贊曰：「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，其論甚美。通達國體，雖古之伊管，不能遠也」。所謂賈誼「言三代治亂之美」，即《漢書》本傳所載「凡所述五十八篇」，《漢書・藝文志・諸子・儒家類》有〈賈誼〉五十八篇，與本傳同。《隋書・經籍志》稱「賈子」、《新唐・藝文志》則稱「賈誼新書」其重要政論〈過秦論〉〈治安策〉皆在其中。賈誼〈過秦論〉，司馬遷錄其部份爲〈秦始皇本紀〉的論贊，另一部份則由褚少孫載入〈陳涉世家〉。至於對漢武帝影響至鉅的〈治安策〉則不見載於〈賈誼列傳〉，反而全篇錄載賈誼的〈鵩鳥賦〉，的確值得玩味的。

案《史記・屈原賈生列傳》云：「屈原既死之後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，皆好辭以賦見稱，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，終不敢直諫……自屈原沈汨羅後百餘年，漢有賈生，爲長沙王太傅，過湘水，投書以弔屈原。賈生者……」以此銜接屈原與賈誼列傳。自楚屈原死後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等，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，百餘年後賈誼出，似在說明楚辭漢賦的承傳關係。《漢書・藝文志・詩賦略》關於賦的部份，有屈賦之屬，陸賈賦之屬，荀卿賦之屬及雜賦等四類。其中屈賦又是賦的主流、有屈原、唐勒、宋玉等外，漢代則有賈誼、枚乘、司馬相如、淮南、兒寬、劉向都屬屈賦流派，〈今上所自造賦〉兩篇也在其中。屈賦之屬共二十家，三百六十一篇。〈藝文志・詩賦略〉小序云：

>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，離騷憂國、皆作賦以風，咸有惻隱古詩之義。其後宋玉、唐勒。漢興、枚乘、司馬相如，下及楊子雲，競爲侈麗閎衍之詞，汲其風諭之義，是以楊子悔之曰：詩人之賦麗以則，辭人之賦麗以淫。如孔氏之門用賦也。則賈誼登堂，相如入室矣，如其不用何！

揚雄之論見〈法言〉。雖云賈誼之賦可登堂，相如可以入室，但終無所施用。卻不能否認他們的作品是漢賦的代表。隋書經籍志集部首列楚辭一類，其小序說屈原死後，「弟子宋玉，痛惜其詩，傷而和之。其後賈誼、東方朔、劉向、揚雄，嘉其文彩，擬而作之」。楚辭淵源於屈原，發展至漢代則爲漢賦。漢賦之作，首推賈誼。司馬遷的屈原賈生列傳。則有鏡考源流，部次流別的徵意在，敘述漢賦的淵源與流別。所以，讀《漢書・藝文志・詩賦略》，屈原賈生列傳是必須參觀的。

司馬遷所謂「悉論次先人所次舊聞，弗敢闕」，已將司馬談校整圖書過程中，鏡考源流的資料，完全分散在史記的著書諸人，及其他有關的各篇中。這些資料匯集起來，就是《漢書》〈藝文志〉、〈諸子略〉、〈詩賦略〉、〈術數略〉的資料來源與淵源所自。不過，司馬談和司馬遷所生存的時代環境不同。由於司

臺灣大學圖書館

馬談生存的時代，是黃老之學自漢初以來，不論在政治和學術思想雙方面，都是主流思想的時代。而且他本人又「學天官於唐都，受易於楊何、習道論於黃子」。[34] 因此，司馬談的思想表現，的確已有「先黃老而後六經」的傾向。至於司馬遷除了繼承其家學外，曾問故於孔安國，又從董仲舒習春秋。更重要的是漢武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之後，政治與學術發生空前的轉變，司馬遷爲了遷就轉變的現實政治環境、其學術思想不得不作某程度的調整。王鳴盛論〈司馬氏父子異尚〉就說：

> 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談論文字要旨，謂陰陽、名、法、道德也。其意以五家各有所長，亦各有所短。並致不滿之意，而獨推崇老子道德，謂其能兼五家之長，去其所短。又特舉道家之指約易操、事少功多、與儒之博而寡要，勞而少功、兩兩相交，以明孔之不如老，此談之學也。而遷則尊儒，父子異尚。漢初黃志之學極盛，君如文、景、宮闈如竇太后，宗室如劉德，將相如曹參、陳平、名臣如張良、汲黯、鄭當時、直不疑、班嗣，處士如蓋公、鄧章、王生、黃生、黃子、揚王孫等等皆宗之。東方朔戒子以首陽爲拙、柱下爲工、亦是尊黃老者、而遷獨不然。漢書本傳贊論謂遷先黃老而後六經。此本班彪之言，固因而述之。桓譚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曰：老聃著虛無兩篇、簿仁義、非禮樂，然好之者以爲莫過於五經，自漢文、景之君，及司馬遷皆有是言。班彪、桓譚以談之言即遷之意。[35]

王鳴盛對漢初黃老之學的盛行，司馬談崇黃老，司馬遷尊儒，班彪、桓譚誤以司馬談之言爲司馬遷之意，作了精闢的析論。不過，雖然司馬遷受董仲舒，孔安國之教，是否眞正尊儒是另外的問題。但，司馬遷將孔子從儒家中分劃出來，並超越諸家，提昇到「至聖」的地位，卻是事實。所以，司馬遷尊孔崇聖是沒有問題的。但崇聖和尊儒卻不能等同視之。司馬遷對孔子尊崇的心情是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」的。所以他適魯，「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，諸生以時習禮其家，低徊留之不能去」。這是《史記》各篇中，司馬遷發思古出情最深刻敘述。已超越史學與文學達到詩意的境界。司馬遷對孔子所以如此，〈孔子世家〉太史公曰：

> 天下君王至於聖人衆矣。當時則榮，沒則已矣。孔子布衣，傳十餘世，學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天下言六藝者折衷夫子，可謂至聖矣。

司馬遷在其自序說他寫《孔子世家》，因爲「周世既衰、諸侯恣行，仲尼悼禮廢

34. 《史記・太史公自序》
35. 王鳴盛《十七史商榷》卷六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樂崩，追修道術，以道達王道，見其文辭，爲天下制儀法，垂六藝文之統於後世」。後世對司馬遷將孔子入世家，是一致贊揚的，認爲這是他崇尊孔子最具體的表現。當然司馬遷將孔子入世家，與陳涉入世家「天下之端，自涉發難」，同樣具有現實意義的。那就是孔子入世家「特以其立六經大法爲漢作制，雖繫周之歲時，而功在漢家社稷」。[36]

所謂「立大經大法」，也就是孔子「備王道，成六藝」因此「天下言六藝者折衷夫子」，與「垂六藝之統於後世」，正是司馬遷寫〈孔子世家〉的意旨所在。關於「成六藝」方面，〈孔子世家〉說：

> 孔子之時，周室微而禮樂廢、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、序詩書、上紀唐唐虞之際、下至秦繆、編次其事觀殷夏所損益。……故書傳，禮記自孔氏。孔子語魯大師；樂其可知也，始作翕如、縱之純如，皦如，繹如也，以成。自衛反魯，然後正樂，雅頌各得其所。古者詩三千餘篇，及至孔子、去其重，取可施於禮義，上采契后稷、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厲之缺、始於衽席……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，以求合韶、武、雅、頌之音。禮樂自此可得而述，以備王道、成六藝。

這是孔子刪詩書正禮樂的過程，然後又序易。《史記・孔子世家》說：

> 孔子晚而喜易，序彖，繫象，說卦，文言。讀易韋編三絕，曰：假我數年，若是，我於易則彬彬矣。

孔子將散漫的文獻資料，作系統化的整理，並付予其所具有的文化的意義。然後以此教授弟子。最後，因見道之不行，恐無以見於後世，於是因魯史而著春秋《史記・孔子世家》說：

> 子曰：弗乎弗乎，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。吾道不行矣，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？乃因魯史而作春秋，上至隱公，一迄哀公十四年，十二公。據魯、親周，故殷、運之三代，約其文辭而指博，故吳楚之君自稱王，而春秋貶之曰子。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，而春秋諱子曰「天子狩於河陽」；推此類以繩當世、貶損之義，後有王者舉而聞之，春秋義行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。

至此，易、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春秋的六藝系統完成。至於六藝的性質與作用，《史記・滑稽列傳》稱：「孔子曰：六藝於治一也。禮以節人、樂以發和，書以道事，詩以達意，易以神化、春秋以義」。司馬遷在自序中對六藝的性質與作用

36. 朱東潤《史記考索》（香港：太平書店，一九七四年重印），頁九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有進一步的解釋：

>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，故長於度；禮經紀人倫，故長於行；書紀先王之事，故長於政；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，故長於風，樂樂所以立，故長於和、春秋辯事非，故長於治人。是故禮以節人，樂以和發、書以道事、詩以達意、春秋以道義。

孔子將六藝系統化整理，然後以教弟子，即孔子世家所謂「孔子以詩書禮樂教，弟子蓋三千人焉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」。六藝之由孔子門弟子承傳播遠。《史記・十二諸侯年表》序敘述春秋的承傳：

> 孔子明王道，干七十餘君，莫能用，故西觀周室，論史記舊聞，興於魯而次春秋，上記隱、下至哀之獲，約其文辭，去其煩重，以制義法，王道備，人事浹。七十子之徒口傳其傳指，爲有所刺譏褒貶挹損之文辭，不可以書也。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眞，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，成左氏春秋。鐸椒爲楚成王傅，爲王不能盡觀春秋，采取成敗，卒十四章，爲鐸氏微。趙孝成王時，其相虞卿上采春秋，下觀近勢，亦著八篇，爲虞氏春秋。呂不韋者，秦莊襄王相，亦上觀尚古，刪拾春秋，集六國時事，爲八覽、六論，爲呂氏春秋。及如荀卿、孟子、公孫固、韓非之徒，各往往根據春秋之文著書，不可勝紀。漢相張蒼曆譜五德，上大夫推春秋義，頗著文焉。

以上所敘關於春秋的流傳及演變。孔門六藝之傳，後來漢儒稱之爲傳經。但孔子以前並無所謂的六經。孔子之門既然沒有六經之學，諸弟子也沒有分經相傳的事實。[37] 自從漢設博士專以一經傳授，推而言先秦孔門傳經系統。於是子思、孟子、荀卿退處百家，而孔子之學集中六藝，另有承傳的系統。因此，孔子的六藝與儒家分劃成兩個不同的學術承傳系統。將孔子的六藝獨立於儒家之外，並超越各家之上，則始於司馬遷。司馬遷史記中對孔子成六藝，六藝的性質與功能，以及六藝的承傳，都作了分別的敘述。雖然關於六藝自孔子卒後至秦以前的承傳或有依託。[38] 但是關於漢儒傳六藝之學，如《史記・儒林傳》所謂言詩於魯則申培公，於齊自轅固生，於燕自韓太傅。言尚書自齊伏生，言禮自魯高堂生，言易自菑川田生。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，於趙自董仲舒。司馬遷根據所掌握的材料，及個人的見聞，對漢初六藝傳經本師的敘述，是可以確信的。

---

37. 錢穆師《先秦諸子繫年》卷一〈孔門傳經辨〉條下。
38. 同上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司馬遷將孔子的六藝超越諸家之上，成爲一個學術的專門領域，雖然和當時現實的政治環境有關，卻規劃出後世經學的研究範圍，班固《漢書・藝文志》的〈六藝略〉即由此而出，同時也鑄定以後中國目錄學經部的版型。章學誠說中國目錄學爲「部次流別、申明大道、敘列九流百氏之學，使之繩貫珠聯、無少缺逸，欲人即類求書，因學就學」。[39] 自來討論目錄學，都從劉向、歆父子與班固的《漢書・藝文志》始，完全忽略了司馬談、遷父子對這方面的貢獻。司馬氏父子奉命整理圖籍，對孔子刪詩書訂禮樂以後的文獻與學術發展，作了另一次徹底而系統的整理。司馬談選擇了黃老作爲主導思想、塑出漢書藝文諸子略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六家的雛形。司馬遷標舉六藝，是後來班固《漢書・藝文志・六藝略》的章本，雖然司馬氏父子整理圖籍的材料，沒有單獨成書流傳後世，但卻已分散在《史記》各篇中，不僅清晰可見，且有脈絡可尋。

司馬遷在〈太史公自序〉最後說：「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，厥協六經異傳，整齊百家雜語」。〈太史公自序〉是《史記》全書的總結。「拾遺補藝，成一家之言」，則是〈太史公自序〉的總結。也是司馬遷撰寫《史記》的意旨所在。這是司馬遷繼承他父親未竟的遺志「先人有言，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年，有能紹明世，正易傳，繼春秋，本詩書禮樂之際」，對孔子整理文獻以後的散亂圖籍，再作一次系統的清理與總結。司馬遷不僅擔負了這個「何敢讓焉」的責任，並且也完成「悉論次先人所次舊聞，弗敢闕」使命。然後，以此爲基礎向另一個目標邁進，那就是在〈報任安書〉中所說：「欲以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變，成一家之言」。前後兩個「成一家之言」表現先後了兩個不同的層次，因爲祇有在第一個「成一家之言」完成後，才能以此爲基礎，進行另一個「成一家之言」。

民國八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脫稿　台北　糊塗齋

39. 章學誠《章氏遺書》，卷十《校讎通義》內篇一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